

桑兵  
张凯  
於梅舫  
编

# 近代中国学术批评

JINDAI ZHONGGUO XUESHU PIP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解 说

近年来，在大陆、香港、台湾的几所大学讲授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这是一门研讨课程，选修的主要是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其中重要内容，是各选一本适当的学术专著学做评论，以促使学生读书和讨论。选择的范围，可以在课程大纲开具的参考书目之内，也可以自选，标准为：1. 已成经典的著作；2. 确有实际贡献的新书。打假之类，不予考虑。那些趋时也容易过时之作，虽然往往能够引起浅学者的共鸣，也不在论列。经过学习，大都可以掌握撰写书评的一般技法，但也普遍遭遇没有适当参考的难题，开始阶段无从下手。同时，近代学术批评的历史已经逐渐进入研究视野，取向路径做法无不无可议之处。于是想到选编一本前贤各种类型的书评，以利后进学习揣摩。

书评有两难，直入流于主观，且只能限于一般，很难论及高明；解语境则容易冗长，形成专题研究，大量陌生的人事，令浅学者不明所以。面对形形色色的见仁见智，后学者如何判断取舍，实为难事。不过，书评要想写到上佳，当然极难，粗通门径，然后循序渐进，也并非无轨可循。

除了文艺批评外，其他学科少有专门从事学术批评之人，因为分科治学之下，罕有学识能够关照全面而又在众多领域深入堂奥，学有专精的通人。如果批评者不是所涉及具体领域的行家，则其意见难以贴切恰当，不易取信于同行。反观近代，欧洲汉学仍不分科，而巴黎学派又聚集了一批高人，尤其是堪称国际汉学祭酒的巴黎学派领军人物伯希和，凭借其过人的学识和功力，越来越将写作的重心放在学术批评方面。在其广泛的批判笔触下，以巴黎学派为中心的国际汉学逐渐减少了原来的随意与外在，水准大幅度提升。尽管伯希和本人反而因此颇为后来的学人所诟病，指其琐碎无系统，当时中国学人却相当惊讶其博学强记，是少有的几位能入高明者法眼的域外学人之一，甚至是首屈一指的不二人选。

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取代巴黎汉学的中心地位做法也有很大改变。转型期间，限于原有的学术基础，问题颇多。本来越过太平洋是要向西方新学取经的杨联陞，目睹状况，改弦易辙，反而回到欧洲汉学的立场，仿效伯希和，扮演“学术警察”的角色，这对于提升美国的中国研究水准，并取代巴黎的中心地位，贡献不小。受惠的异域学人对此予以很高评价。当然，在后来一些学人看来，教洋人读书的杨联陞似乎也难免重蹈伯希和的覆辙。

杨联陞萌生当“学术警察”的志向，显然受伯希和的影响，其用功方向也因而改变。这样的改变对于他本人、美国的中国学界乃至国际的中国研究，得失互见，利弊兼有。不过，杨联陞最初的目标，不仅是美国的中国学界，而包括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学术界。因为抗战长期动荡的影响，在缺乏资料等条件的情况下，战前积累起来的学院化学术的严谨逐渐涣散，乱相纷呈的学术界使得杨联陞等一批学人忧心忡忡，纷纷呼吁设法改善。抗战胜利不久，他致函刚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认为“中国的史学界需要热诚的合作跟公正的批评。到现在为止，多数的史学同志，似乎偏于闭门造车。谁在那儿研究什么，别人简直不清楚”。进而建议，各校加强通讯联系，经常交换教授和研究人员，分区组织史学会，开会讨论学术，并吸收研究生和优秀本科生参加，合作整理并发表史料，搜访并保存史迹，合作编辑丛书和工具书等，尤其是“出版一个像《史学评论》一类的杂志，特别注重批评介绍（书籍文章都好）中国需要很多像伯希和一类的‘汉学界的警察’”<sup>①</sup>。这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一些中国学人的心声。

中国早有学术批评的传统，只是形式与近代以来的差别较大，除了序跋、评点、注疏，学人多在相互通信或会晤时交换意见，或在相关著述中有所讨论，较少专门的书评，也没有发表的园地。这样的传统在近代仍然发生作用，高明者往往不喜欢褒贬时人，更不愿以书评的方式公开、直接地表达对学术著作的不同看法。当然，也有一些以输入新知为职志的学人，模仿外

---

<sup>①</sup> 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第57页。

国同道，以书评的方式，或表达不同意见，或推介新颖的论著。梁启超和胡适即为代表。梁启超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不仅正式发表，而且跑到北京大学作专题演讲，使得同样致力于学习外国的胡适私下里抱怨其不通人情。胡适也好发表书评，大概褒多贬少。这并非他没有批评性见解，而是公开的书评多选肯定，否定的论著，则在书信日记中表明意见。近年来，学术批评的历史已经开始进入学人研究的视野，可惜关注的目光局限于少数报刊上专门的书评，而且所选择的报刊不无随意性，未作广泛阅读和区别取舍的功夫，盲人摸象，所论自然难以登堂入室。

对于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材料的别择包含两方面：其一，载体。晚清开始出现学术性刊物，逐渐成为发表书评的重要园地。民国时期，发表书评的刊物主要有：图书馆刊、读书杂志、专业化的学术刊物（包括国学）、学术机构或团体的机关刊物、综合性学报，以及报纸副刊（如《大公报·文史》、《益世报·史地》等）。其中有的刊登书评虽多，水准却不高，大都是一般性介绍。选择哪些刊物为代表，本来已经主观，若事先没有广泛阅览，所定刊物以及相关讨论的意义，在整体脉络中的位置，等等，都难以把握判定。

其二，取材。好的学术评论未必以书评形式刊登于报刊，至少还应包括以下方面：

1. 学术著作的评审鉴定。最为著名的如陈寅恪、金岳霖等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扩而大之，能够纳入近代学术批评研究范围的层面甚多，如研究生的答辩，各种科研基金的评审（如中英庚款董事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科研补助金），部聘教授和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评选，学术奖项的评议，学术会议、学术演讲的讨论，甚至本科生论文的评语，等等，其中不仅故事甚多，而且可以比较各人意见的差异与见识的高低。

2. 序跋。写序跋与读序跋，很是一门艺术，如何坚持己见而不曲学不伤人，相当考究，解读时也须力透纸背，才能从江流曲似九回肠中体会一片冰心照玉壶，以免为过去学人往往好用其短的故意所误导。

3. 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往往涉及先期研究的评介。尽管这方面不少禹内学人至今仍不能认真对待，许多论著因而形同废词，无法纳入学术发

展的脉络，为一大缺憾，毕竟治学如聚沙积薪，后来居上，已经逐渐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的共识。

4. 相关研究的本文论及前人著述，又分为明指与暗喻两个层面。指名的讨论固然重要，实际的暗讽更值得注意。如余嘉锡的著作，续修四库提要等，都或明或暗地对当时的学术有所评点。只是对于暗喻的具体判断存在或然性，必须前后左右，小心求证，以免诛心之论，厚诬前贤。另外，历次学术论争，从一定角度看，也有书评的味道。如胡适的《说儒》，即吸引多位名家参与讨论，反复辩驳，且引发其他枝蔓，从中可以获得无穷信息，值得专题讨论。

5. 学术综述。近人每隔一段时间，好对具体学科的发展变化加以总结，留下了不少的综述或学术史的专著，整体如若干年来学术发展趋向，具体如国学及各学科的阶段发展概述。其中涉及众多学术著作的评价。

6. 书信、日记、笔记掌故、回忆录等私下的文字与口碑。因为少了忌讳，虽然有些随意，且无论证，却能够一针见血。总体而言，学术批评的高下因人而异，高明者的只言片语，常常比一般性的专门书评更加恰到好处。如陈寅恪对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评点。当然，口耳相传的记述，是否表达本意，需要鉴别互证，如陈寅恪对古史辨的评价，包括其身边人士的说法，都未必反映陈的真意。此外，不少书信披露报端，已经超越私家领域，成为近代学术批评的特色，是否因而失去一些率真与锐气，也须仔细斟酌。

当然，要想写好书评，更重要的还是对所评著述涉及的领域有高屋建瓴而精深的把握领悟，能够接近甚至超越所评对象，否则难免隔靴搔痒。书评如治学，胸有成竹才能庖丁解牛，游刃有余，恰到好处，这也是学术批评无法专门的关节。而理解内在理路的途径，由俱舍宗而俱舍学之法不失为正途大道。

本书的目的，并非提供近代学术批评史的参考资料，而是想选取若干范本，显示近代学人撰写书评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层面。因此，取材重在书评的类型、书评与作者的关系等方面的代表性，而非所评的范围与对象。这种形

式上的由例及律，不过方便初学，至于最为重要的本事方面的证，只能留待各位术有专攻之后。

这一时期新旧交替，中西混杂，各色学人，各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及活动舞台，表现方式也因人而异。具体到书评方面，内容固然看法不一，一般而言，老辈仍未放弃以评点为形式，宋育仁对胡适和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主张，即逐句点评。

日本学者对中国学人的影响，不止于晚清即明治时期，大正乃至昭和时期，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的影响一直持续，只是受到 21 条等影响，中国学人在普遍参考日本学术成果的情况下，回避提及所依据的出处，这很难用学术规范的概念加以评判。不过，在此背景下，一些日本学人对中国学术著作的评论以及关于国际中国研究的讨论，反而很受中国学人的重视。桑原隲藏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书评，言辞犀利，在中国学术界影响久远，据说其对梁启超著述的公开评价还算手下留情。日本学人评审柯劭忞的《新元史》，并授予其文学博士学位，背后固然有官方的政治用意，但评审意见本身，却不失为学术准则拿捏得当的佳作，一度成为中国学人学习仿效的范本，翻译后多家刊物予以转载。由于上述原因，这两篇文字，虽然出自外国人之手，还是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学术批评的一部分。

其他各篇的选取，主要考虑层次与类型，兼顾所评书籍及其领域。从便于后来人逐步体味的角度看，以下几类可以显其层次：《燕京学报》第 30—32 期刊载的一组书评，为向本科到博士生推荐的参考读物。作者大都为抗战前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的成员，所评各书则在各方面颇具代表性。燕京大学历史学会，聚集了一批天分很高的新锐学人，战前即在北平学界小有名气，所出版的《史学年报》和《史学消息》，已经包含部分书评。经过长期的浸润，这批青年学生成长为训练有素的学人，在战后乱象横生的学术界进一步崭露头角。他们在保持原有锐气的基础上，又增长了见识和老到，目光如炬，下笔精当，加上刊物经历数年的停顿，稿件选择的余地较为宽裕。这组书评，是非曲直，直言不讳，或许令被评论者难堪。这样的袒露与直白，还是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逞强，却相当符合国际学术界书评的

准则。

张荫麟可以说是由书评一举成名，还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以质疑梁启超的老在孔后百余年之说而一鸣惊人，甚至更加受到梁的器重。张荫麟天赋极高，训练也好，陈寅恪、钱穆等都对其期许甚殷。他所撰写的一系列学术评论，的确独具慧眼。如果要在近代中国学术界选举一位善于而又肯写书评的学人，张荫麟当是强有力的竞争人选之一。

孙楷第在近代学术界的位置有些特殊，他与胡适关系不错，实际上却对胡的学术不一定以为然，比较接近的还是陈垣。他的研究领域是文学史，但显然不完全走专门化的学术路线。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用功极深，博览群书的陈寅恪也自叹不如。孙楷第不动声色，点到即止，恰到好处，兼得长辈的平实与新进的敏锐。

近代中国史学界，以功力之深，见识之精而言，很少有人能在陈寅恪之上。可是，不议论人物的陈寅恪，也几乎从不写书评，这并不等于他没有看法意见，只是多在公私场合口头表达，而非诉诸文字。当然，陈寅恪也有其表述的形式，即为友人和弟子辈撰写序言。这种形式，自然不会畅所欲言，较少直接提出批评。陈寅恪除了对所评著作及作者予以表彰之外，常常以此表达其对于学术的整体主张，以及对于学风弊病的不满。仔细琢磨其评语，也可以发现其中分寸把握的区别，有的序言或许主要的意思其实并非表扬。将批评写成看似褒奖，可谓撰写评论的极高境界。只是以此考验学识，有时未免令后人费解。而体现这样境界的典型之作，首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的审查报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人都从积极的角度征引审查报告，后来逐渐发现，下册审查报告批评的意味比较明显，而上册审查报告似也暗藏机锋。如陈寅恪所说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应对古人学说具了解之同情，以免隔阂，同时又指出：“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

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虽然他表彰冯友兰的著作“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利用材料别具特识<sup>①</sup>，可是他批评民国学者“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又声明自己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有心与清儒立异外，不愿图画鬼物，当是重要原因<sup>②</sup>。

书评须由书知人，因人解书，一般而言，认识越深理应越能接近，若是相反，则或是对象太过高明，或是自身能力有所不足，结果都不能从容驾驭。高山仰止式的推崇，过于隔漠，很难贴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空话，不足以表明所评对象的优劣，反而显示评论者的水准。另一方面，不看书或看不懂也要强说意见，甚至为批而批，则难免妄言，以无知无畏为放言高论。这样的书评，或许成为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却没有学术讨论的价值。好以批判为著作的李季、孙次舟多少近似。后者毕业于北京中国科学院国学系，曾任山东省立临沂中学国文教员、山东省立图书馆编辑员<sup>③</sup>。抗战期间，孙次舟因事与傅斯年有所交道，傅斯年的回信，可以透露孙次舟为人行事的一些信息，函谓：

中英庚款会来函附阁下致华西张校长来信。人生世上，此等到〔至〕简单之礼貌，亦或不〔不能〕，可叹也。中英庚款会来信，谓华西既不可入，可否仍向徐中舒先生处去。惟以愚见论之，阁下因自谓世上无可指导之人，去亦未必有益。此会补助，闻最多者二年，是则今夏一切结束耳，可自求高就，以骋大才矣。又，来函自称学生，以阁下之狂，何至如是，仆实受宠若惊。前年初晤，曾以

<sup>①</sup>《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280页。朱自清记：1933年2月13日浦江清与之论著述，“以为只总结帐及划时代之作为价值，述古多而创新少则不足论。冯芝生哲学史，渠意当属此类”。又3月4日记：陈寅恪论哲学史，“以为汉魏晋一段甚难”（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96、202页）。浦江清所说，显然是陈寅恪的意见。

<sup>②</sup>《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9—270页。

<sup>③</sup>桥川时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北京：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第312—313页。

“做实在工夫，勿作无谓辨〔辩〕论”及“虚心整理事实，勿复盛气驰骋己见”二义相劝，并无一接受，则仆虽厕名指导，实不能为足下师明矣。累次来信，皆不解所云，若谈一问题，而为仆所知，自当竭诚奉告，今连篇累牍，皆非仆可以作答者也。言尽于此。<sup>①</sup>

钱穆《中国史纲》出版，各方好评甚多，而孙次舟发表《评钱穆中国史观》一文，“肆意抨击，全是小人行径”。金毓黻叹道：“韩昌黎诗云：‘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其孙君之谓乎！孟子云：‘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名愈大，则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同时并至。今观孙君所论，真所谓求全之毁也。且其用心甚属险恶，摭取《国史大纲》中一二语，以明其不满于当代，而有讪谤时贤之意，几欲以此兴文字狱，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近顷欲甘心于钱君者，不止孙君一人，皆由其善著书名满一时使然。韩退之云：‘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怠与忌二者，毁之所由来也。孙君本怠于自修，而又忌钱君之能修，所以有此求全之毁。小人可畏，至于如此。古人著书不轻刊布，直至身后乃得行世，正坐此故。甚矣，小人之可畏也！”<sup>②</sup>不久又于日记中道：“徐澄宇语某大学学生云：‘非骂人不能出名，且须取极出名人骂之。’得此诀者又有孙次舟，今世学人不为孙次舟骂者，盖已鲜矣。《唐语林》卷五，‘宋璟劾弹昌宗等反状，武后不应。李邕立阶下大言曰：璟所陈社稷大事，当听！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让曰：子位卑，一忤旨，祸不测。邕曰：不如是，名亦不传’。黻按：如澄宇及次舟，皆窃李邕之术以求出名者也。邕为唐代闻人，以口无择言，不得令终，宜引以为戒，又何可效之耶！”<sup>③</sup>

写书评不同于体育裁判，可以只讲规则，不会实战，也不是成果鉴定，不是老师改卷，不是基金评审，不是编辑看稿，不可存了人为鱼肉，我为刀俎之心，不可以为人皆愚昧，唯我高明，随心所欲，乱发横通之论。须知评

<sup>①</sup>1940年2月24日傅斯年致孙次舟〔抄件〕。

<sup>②</sup>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5228—5229页。又见同书第5251—5252页《钱宾四教授以所著国史大纲见贻，喜不自胜，报以此诗，得三十韵》。

<sup>③</sup>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325页。

点他人，同时也是检验自己。著述与评议，都将奉上学术祭坛，永远接受举世的审判。不仅时贤在侧，更有古今中外的大智大能，冥冥之中，法眼如矩。若存心击人之短，炫己所长，或许适得其反，不能藏拙，适以献丑。即使如论文评语，研究生答辩等，虽然俨如法官判案，双方地位极不对称，实则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良心学问俱受检验，必须心存敬畏，谨慎从事，不得妄加褒贬，不知而作。胡批固然贻笑大方，谬奖也只能自暴其短。若强以不知为知，不惜以讹传讹，甚至违背学术良知，偏离公平公正，则一失足成千古恨。治史之人，需具历史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将由后人反复研判，今日评点他人之举，他日即为别人评点之据，可不戒惧哉！

就形式而论，高明的书评往往短小精悍，褒贬评介，恰到好处，不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套话，又有超越具体讨论问题的意义价值，可以反复品尝，韵味隽永。这对时下书评往往过于冗长，不无借鉴作用。

本书选材，挂一漏万的偏蔽在所难免，加之版权与著作权法的限制，一些高论无法纳入，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与文化遗产和普及之间求得平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考验人类智慧的一大难题。今后当依据情形，随时调整，以臻精当。编辑方面，弟子张凯、於梅舫承担了主要工作。张凯于版权联系方面用力尤多。正文尽量根据最早的底本，并参照其他各版，有所校勘。

桑兵

2007年1月23日

目 录

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 1

刘伯明：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 17

宋育仁：评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 23

柳诒徵：评陆懋德《周秦哲学史》 ..... 39

张荫麟：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 ..... 48

    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 ..... 50

    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 ..... 68

金岳霖：《中国哲学史》（上）审查报告 ..... 75

石峻：评黄子通先生著《儒道两家哲学系统》 ..... 79

朱光潜：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 ..... 86

张申府：《新原人》与《新原道》 ..... 96

傅斯年：蒋维乔之《论理学讲义》 ..... 101

冯友兰：评冯振著《老子通证》 ..... 104

傅斯年：马叙伦著《庄子札记》 ..... 107

齐思和：《十批判书》 ..... 111

容肇祖：《清儒学案》述评 ..... 113

与忘：《墨经易解》 ..... 117

袁大韶：《国学基本丛书》第二集之商榷 ..... 121

〔日本〕桑原隲藏：读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 126

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 136

张德昌：缪凤林著《中国通史纲要》 ..... 144

童书业：读缪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 ..... 148

    评《中国历史教程》 ..... 153

|                           |     |
|---------------------------|-----|
| 陈梦家：评张荫麟先生《中国史纲》第一册 ..... | 158 |
| 读《天壤阁甲骨文存》 .....          | 164 |
| 胡适：评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 .....    | 169 |
| 傅斯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 ... | 173 |
| 齐思和：评马斯波罗《中国上古史》 .....    | 179 |
| 王锺翰：《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     | 192 |
| 齐思和：《春秋史》 .....           | 197 |
| 安志敏：《中国史纲》 .....          | 199 |
| 王伯祥：读《经今古文学》和《古史辨》 .....  | 203 |
| 程憬：顾颉刚编的《古史辨》 .....       | 215 |
| 刘节：评《刘向歆父子年谱》 .....       | 223 |
| 贺昌群：《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     | 226 |
| 蒙文通：评《学史散篇》 .....         | 230 |
| 王锺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     | 240 |
| 王育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 243 |
| 孙楷第：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    | 246 |
| 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系教授会：        |     |
| 《新元史》论文审查报告 .....         | 261 |
| 〔日本〕桑原隲藏：读陈垣氏之            |     |
| 《元西域人华化考》 .....           | 265 |
| 孙楷第：评《明季滇黔佛教考》 .....      | 271 |
| 方子铭：评张星烺氏著《欧化东渐史》 .....   | 283 |
| 罗尔纲：《中国秘密社会史》 .....       | 290 |
| 齐思和：《中国史学史》 .....         | 294 |
| 梁方仲：《中国田赋问题》 .....        | 295 |
| 吴志慎：谢无量著《中国古田制考》 .....    | 299 |
| 劳榦：《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论丛》 .....     | 302 |
| 雷海宗：《世界史纲》 .....          | 310 |

沈 鉴：《欧洲近代史》 ..... 319

萧公权：《西洋近代政治思潮》 ..... 325

浦江清：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 ..... 327

傅斯年：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 ..... 333

吴世昌：评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第一、三、四各册 ..... 336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 ..... 347

王 瑶：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 ..... 356

王国维：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 ..... 367

石 峻：读近译《道德经》三种 ..... 376

吴达元：《福楼拜评传》 ..... 383

齐思和：《遁堪文集》 ..... 388

未 未：《校雠学史》 ..... 390

邓之诚：《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节选） ..... 392

穆士达、马玉铭：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 ... 394

附录 ..... 402

# 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梁启超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19 年

—

近年有两部名著，一部是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部是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哲学家里头能够有这样的产品，真算得国民一种荣誉。两位先生的精神，可谓根本不同，差不多成了两极端。然而我对于他们，各有各的佩服。他们都也曾要求我对于他的大著切实批评，我读这两部书的时候，也随时起了许多感想。但苦于没有时候把他聚拢写出来。这回乘哲学社讲演之便，我很愿意将我所见提出来和诸君讨论，并求两先生指教。

今日先批评胡先生的《哲学史大纲》。但批评之前有三件事应该声明。

第一，批评和介绍不同。介绍，只要把这书的要点和好处提掇出来便够了。批评，不单是如此，是要对于原书别有贡献。胡先生这部书，治哲学的人大概都读过，都认识他的价值，用不着我添些恭维话来介绍。所以我只是把我认为欠缺或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

第二，我所批评的，不敢说都对。假令都对，然而原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因为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锐敏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第三，我所讲的，有时溢出批评范围以外，因为我有些感想，没有功夫把他写出来。趁这机会，简单发表一发表。又原书还有许多小节，和我意见不相同的。因时间限制，只好省略了。

## 二

凡学问上一种研究对象，往往容得许多方面的观察。而且非从各方面观察，不能得其全相。有价值的著作，总是有他自己特别的观察点，批评的人，尽可以自己另外拿出一个观察点来，或者指驳那对手的观察点不对。然而总要看定了人家的观察点所在，而且绝对的承认他相当之价值。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观察得异常精密，我对于本书这方面，认为是空前创作。其间想替他修正之处很有限，而且非批评的焦点。我所要商量的，是论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应以此为唯一之观察点？这观察点我虽然认为有益且必要，但以宗派不同之各家，都专从这方面论他的长短，恐怕有偏宕狭隘的毛病。

胡先生专从时代的蜕变，理会出学术的系统，这是本书中一种大特色，我们既承认他的方法不错，那么对于各时代真切的背景，和各种思想的来龙去脉，应该格外慎密审查。我对于本书这方面，觉得还有好些疏略或错误之处，应该修正。

胡先生是最尊“实验主义”的人。这部书专从这方面提倡，我很认为救时良药。但因此总不免怀着一点成见，像是戴一种着色眼镜似的，所以强古人以就我的毛病，有时免不掉。本书极力提倡“物观的史学”，原是好极了。我也看得出胡先生很从这方面努力做去。可惜仍不能尽脱却主观的臭味。我也知道这件事很难（我自己便做不到）。但对于“学问成家数”的胡先生，我们总要求他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这是我对于这书的总批评，以下分段别论。

## 三

这书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著者倡“诸子不出王官”之论（原书附录），原是很有价值的创说，像刘歆、班固那种无条理的九流分类，每流硬派一个官为他所自出，自然是不对。但古代学问，为一种世袭智识阶级所专有，是历史上当然的事实。既经历许多年有许多聪明才智之士在里头，自然会随时产生新理解。后来诸子学说，受他们影响的一定不少。胡先生曾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三五页），这话很对。可惜我们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了。胡先生的哲学勃兴原因，就只为当时长期战争，人民痛苦这种论断法，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次段更加详辩。依我看来，夏商周三代——最少宗周一代——总不能说一点文化没有。《诗》、《书》、《易》、《礼》四部经，大部分是孔子以前的作品。那里头所含的思想，自然是给后来哲学家不少的贡献，乃至各书所引《夏志》、《商志》、《周志》以及周任、史佚……等先民之言论，许多已为后来哲学问题，引起端绪。大抵人类进化到某水平线以上，自然会想到“宇宙是什么”，“人生所为何来”、“政治应该怎么样”……种种问题，自然会有他的推论，有他的主张，这便是哲学根核。例如人类该怎样的利用自然适应自然，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最刻意研究的问题。这问题决非起于老子、孔子，像《诗经》说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唯号斯言，有伦有脊”，《书经》说的“天叙有典，天秩有礼”，“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易经·爻辞》说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直方大”，“观我生进退”，“不远复，无祇悔”……等等，都含有哲学上很深的意义。《左传》、《国语》里头所记贤士大夫的言论，也很多精粹微妙之谈，孔子、老子，自然是受了这种熏习，得许多素养，才能发挥光大成一家之言。胡先生一概抹杀。那么，忽然产生出孔老，真是他所说的“哲学史变成了灵异记神秘记了”。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诸君细读这书，可以看出他有一种

自定的规律，凡是他所怀疑的书都不征引（但有时亦破此例，下文再论），所以不惟排斥《左传》、《周礼》，连《尚书》也一字不提。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消，简直是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我以为总不是学者应采的态度。又如《管子》这部书，胡先生断定他不是管仲所作，我是完全赞成的；若说管仲这个人 and 后来法家思想没有关系，我便不敢说。胡先生说：“管仲是实行的政治学家，不是法理学家。”（三六三页）请问，难道实行政治家就不许他发明些少法理吗？管子书中许多奥衍的法理，我绝对承认是由后人引申放大，但这种引申放大的话，为什么不依托令尹子文？不依托狐偃赵衰？不依托子产？独独依托管仲，便可以推想管仲和这种思想渊源，一定有些瓜葛。我对于孔老以前的哲学，拿这种态度来观察他，以为必如此才能理出他的来龙去脉，不知胡先生以为何如？

#### 四

这书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胡先生对于春秋以前的书，只相信一部《诗经》，他自己找一个枯窘题套上自己，所以不能不拿《诗经》的资料作唯一的时代背景，殊不知《诗经》的时代，在孔子、老子前二三百年（这还是照原书三六页所推算的，其实书中所引诸诗有许多恐怕年代更在前），岂不是拿明末清初的社会来做现在的背景吗？何况讲古代哲学，自当以战国为中心。战国学术最盛时，上距孔子又二百多年了。胡先生拿《采薇》、《大东》、《伐檀》、《硕鼠》诸诗，指为忧时的孔墨，厌世的庄周，纵欲的杨朱，愤世的许行……思想渊源所从出，简直像是说辛幼安的《摸鱼儿》、姜白石的《暗香疏影》和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有什么联络关系，岂不可笑？胡先生亦自己知道有些牵强，所以只说个“怀胎时代”（但那篇名却标的是“哲学发生时代”）。但我所不解者，出胎时代的背景，自然比怀胎时代尤为紧要，为什么把次要的说了一大堆，那最要的倒不说了呢？怀胎一直怀了两三百年，为什么老产生不下来？两百年后，为什么忽然便会产生呢？这都是史学上极要关键。胡先生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不能